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



周 柠 / 摄

【编者按】日前,浙江省工商联发布了“万家民企营商环境报告”,公布1.6万多家民企给浙江“一号改革工程”打分的结果,发布营商环境综合十强榜单、分项十强榜单,也给浙江要成为“贸易投资最便利、政府服务最高效、干部作为最担当、法制保障最有力、经济生态最健康的营商环境最优省”目标,提供参考依据。

刘 亭 / 文

欣闻省工商联日前发布2022年度浙江省“万家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报告”。对于营商环境的好与不好,我们现在开启了一扇“市场主体说了算”的大门!

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还真不小,它给予了我们多方面的思考与启示。

首先,它深化了我们对优化营商环境意义的再认识。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形势下,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国一地的发展,固然要仰仗必需的元素,但元素其实是分成了两种:一种是不可移动要素,一种是可移动要素。

不可移动的要素主要就是土地、矿产、区位、气候,等等。老天爷如果给你了,你就有了;如果没给你,你就真的没有。但是从几百年工业化以来,现在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了,那些个不可移动的要素,对于一个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地位和影响,是在不断地下降之中。那么相对而言升高的是什么呢?升高的都是可移动的要素。

所谓可移动要素,我们可以重温一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全要素论。里面一共点到了七个要素,其中除了土地是不可移动的以外,剩下六个都是可移动的:劳动力包括人才、资本、知识、技术、管理、还有数据,哪个又不是“择枝而栖、云游四方”的!

一个地方的可持续发展,毫无疑问要靠要素的全面丰裕,但更要靠要素的优化配

置。不可移动的要素固然不可或缺,但已不是竞争制胜的决定性因素。汲取可移动的元素为我所用,才是区域激烈竞争中最终胜出的一大法宝。也正因为如此,党的二十大才一再强调“三个第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但是,这些能移动的要素,凭什么就到您这里来而不别的地方?那就取决于您这里能否营造出一个一流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市场经济就是要趋利避害的,这是客观规律、无可违拗的。好的营商环境,意味着资金和成本的洼地,人家都愿意往这儿投;好的营商环境,又意味着人才和事业的高地,人家都愿意在您这里干。

或是四面八方、望风来投,或是如鸟兽散、“胜利大逃亡”——是祸是福,一切都归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营商环境这个看起来再“软”不过的东西,最后竟然成了区域竞争中最硬的竞争力。现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都比较充分了,只有“君子求诸己”,老老实实地把自身的营商环境建设好,优化到位,才有希望在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终成正果。

其次,它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树立了一种讲求实事求是的新风。经济工作本来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领域,但无可否认,这些年来也有一些不良风气在潜滋暗长。譬如政策多变、无所适从;各自为重、合成谬误;一刀切、运动式;作秀摆拍、形式主义,文山会海、官僚主义,还有烦琐哲学、过度考核,等等。说

到底,出现上述种种问题,都与那种“唯上不唯实”的潜规则在“作怪”有关。

传统的考核,往往是经体制内、系统内自上而下推进的。这对上级机关推动工作部署的落实肯定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当然也不可过多过滥。但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套用这种思维和办法,恐怕也是有问题的。譬如对各地营商环境建设成效的评价,可以有一些客观的数据加以说明。但说一千道一万,就像企业生产的商品好不好,最后终究要看消费者是否愿意“埋单”一样。对营商环境的评价,还是要看政府部门的服务对象——市场主体的切身体验和实际感受。为了避免过多的花拳绣腿,釜底抽薪的一招,就是把相关评价的权力,交到市场主体的手中。

当然,在更长的一个时段里,一地的营商环境是否理想,最后还是要看招进来、落得下、留得住、干得顺的企业有多少?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或是那些需要转型升级的企业,是囫圇个一股脑儿搬走了,还是像地瓜经济那样,把总部和生产性服务业给留下了?政治民主有时要靠用手投票,经济民主也会体现在“用脚投票”上。

营商环境的形成,涉及政府及官员,和市场及企业两个方面。“一只碗敲不响,两只碗响叮当”。但是,在这两方面中,哪一个才是主要方面呢,毫无疑问还是在于政府和官员。这里的政府,是泛指广义的政府,包括了党政和人大、政协,以及公检法司,也即整个上层建筑。

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其中确有市场主体发育不足、企业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但老话说:“人随王法草随风”,关键还是在于“王法和舆论”,在于“权力不可任性”。日前我曾有幸参与对湖州市营商环境的实地调研,他们已然开始实行市场主体对政府部门的评价考核,甚至连相关的奖项都是由企业代表来颁发的。这就很好,给政府及官员,也包括整个社会,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今后要让更多的服务对象,来评价考核您服务的量和质,来检验您“人民政府为人民”的表现和担当。

最后,它提醒我们还要切实促进工商文明的进步。营商环境一大块是基础设施等硬环境,这一块经过改革开放45年来的投资和建设,已然取得巨大的进展。但相比之下,制度和人文的软环境还存在较大差距。制度后面是制度文明,制度的落实也要靠人文环境。为什么大家都爱说“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呢?这是因为营商环境是和人文融为一体的、有温度、可感知、可体验的环境,而不仅仅是建在地上的基础设施和挂在墙上的规章制度。

现在评价营商环境,一般都涉及行政、法治、要素、市场、人文等多个方面。这是理论上的抽象,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几者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的。人文这个东西,表面上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作用。“八八战略”的最后一条,就强调了要发挥我们

的“人文优势”,我也总愿意把人文经济和民营经济、生态经济、数字经济连在一起,说成是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四张金名片”。

中国有着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曾在这个形态上雄踞世界之首。但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我们是大大地落后了。虽经洋务运动和民族工商业的努力,也曾追赶了一阵,但历史性的进步,还是发生在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里。本世纪初,我们曾估计2020年可以基本完成工业化,现在看来,说得“冒”了一点。

无论是产业科技还是工商文明,我们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譬如精工制造、品质制造,工业化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不到位,那就难免会有点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更不要说像产权、契约、诚信、法治这一整套的东西,我们要想明白、做到位,确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现在是工业化尚未到位,数智化时代已然来临。我们既要争数智化的先,但还得补工业化的课。万丈高楼平地起,认知和理念的大厦,同样不能建立在沙滩上。

优化营商环境是政企两方面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我们有了市场主体评价考核政府部门相关工作的制度创新,但要确保这种创新的质量和实效,以及它的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还必需在全社会形成与工业化相适应的工商文明,和制度型开放及中国式现代化相契合的高水平的现代工商文明。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副主任、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为什么是浙商?

徐王婴 / 文

阳春三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的记者会上,李强总理再提浙商“四千精神”,犹如一阵春风来。总理的话音,令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大地感受到了盎然春意。

“四千精神”,是浙商群体的精神图腾,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所有民营企业奋发向前、敢拼敢闯的集体写照。正是靠着“四千精神”,浙商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成长为中国第一商帮。

为什么是浙商?为什么是浙商“意象”了中国民营企业族群,写照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中国商帮历史悠久。数百年前,就有晋商、徽商、潮商等十大商帮的活跃与兴衰。

晋商、徽商等近代商帮衰落之后,以浙商为代表的现代商帮为何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快速崛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浙商的草根性。

45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激活了浙江大地成千上万“穷则思变”的“泥腿子”们,他们“敢闯、敢冒”,“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点燃了个私经济、乡镇企业的“星星之火”……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前,“草根”们的创业梦想就已蠢蠢欲动。

上世纪70年代初,横店的“掏粪汉”就已领着乡亲们盘下当地一家濒临倒闭的缫丝厂;萧山24岁的“打铁匠”变卖了全部家当创办起农机厂;杭州笕桥30岁的“农舍女”带着村民们创办了丝绸厂……到了1978年,原本潜伏“地下”的商业力量开始登台亮相。徐文荣开启了率领横店人大刀阔斧的创业历程,如今横店集团已是总资产近900亿的超大型民营企业;沈爱琴则与全厂

员工满世界跑推销,而今由其女儿接班的万事利集团已成为中国民营500强企业;鲁冠球则在1979年开始专攻“万向节”,此后凭着小小的万向节,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第一家进入国务院试点企业集团的乡镇企业……

诚然,改革开放45年来,浙商从走街串巷“鸡毛换糖”到踏出国门“买卖全球”,从首批民营航空公司开航到首条民营控股高铁开通运营,从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到世界级企业顶天立地……他们凭借一股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弄潮儿”精神和“四千精神”,开启全国民营经济之先河,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振奋的创业传奇……

有数字显示,2022年浙江经济总值(GDP)77715亿元,同比增长3.1%。其中浙江民营企业增加值15385亿元,比上年增长5.2%,占规模以上工业的70.3%,贡献率达83.2%……

毫无疑问,由“草根”浙商率先点燃的“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民营经济,其“星星之火”已然呈“燎原”之势。

从古时的“无宁不成市”,到今天“无浙不成市”的传说,浙商都是最具“游牧性”的商帮。

有数据为证:改革开放以来,浙商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全国各地投资创业的浙商超过了600万,还有近200万浙商走出国门,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生逢其时的浙商,不仅得益于“江南地气暖”的先发优势;还有吸天地之灵气、藤蔓四处伸展的“地瓜经济”。

在政策支持下,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商机。而浙商,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一股中坚力量。比如,上海2021富豪榜上,排名前10位的富豪中有5位是浙商;又比如安徽

阳光电源创始人曹仁贤、深圳大疆无人机创始人汪滔等都是浙江人。另有报道显示:截止2022年上半年,在江苏投资的浙商,其市场主体达146.38万户、总投资额超2万亿元;截止2019年,在疆浙商达26万人,累计投资超过5000亿元……还有正泰在泰国的智能制造基地、华立在泰国和墨西哥的工业园区、红狮集团在老挝等四国的水泥项目、锦江集团在东南亚的综合电厂等等,地瓜的藤蔓早已延伸到世界各地。

是的,素有“东方犹太人”之誉的浙商,谱写了“无浙不成市”的传奇,打造了遍布海内外的“义乌市场”“浙江村”“温州村”;并实现了浙江市场的迭代更新、转型升级……

新年伊始,借着浙商“包机出海”的东风,浙江部署实施创新、改革、开放三大领域的三个“一号工程”。其中,“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被广大浙商寄予了良好的期望。

因为,与其说是地瓜经济的“藤蔓”拓宽了浙商发展与腾挪的空间;不如说,浙江政府对民间力量的鼓舞与利用,对改革开放的坚持与深化,对营商环境的不懈努力与优化,是浙商得以持续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如果说,“停不下来”的改革精神,是浙江得以实现跨越发展的永动机。创业不停、创新不止,则是浙商不断实现自我突破,从草根浙商到数智浙商、创新浙商的成功密码。

依靠“行商天下”积累第一桶金的“草根浙商”们,以贸带工、“前店后厂”地“点火”浙江制造业,至2003年之前形成了诸如温州皮鞋、打火机、嵊州领带,义乌袜子,宁波家电等块状特色产业。进而带动了诸多浙江小商品市场的繁荣。

但“8亿件衬衫才换回一架空客,10亿

双袜子才能换回一架波音”的“低端”与“末梢”,毕竟不是浙商制胜的王道。为此,浙江在20年前就提出了“八八战略”,开启了“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和培育“名企、名品、名家”的“四换三名”工程;浙商也由此开启了转型升级战。

也是这个时候,浙商的队伍里注入了“浙大系”“阿里系”“海归系”等新鲜血液。比如杭州立昂微电子的王敏文、宁波江丰电子的姚力军、锦浪科技的王一鸣等等,他们率领着企业深耕半导体、光伏逆变器领域,突破多项技术壁垒,解决“卡脖子”难题,成为细分行业的领军企业;比如零跑科技的朱江明、每日互动的方毅、遥望科技的谢如栋等等,他们不断探索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直播电商等,在新经济领域风生水起。

一边是科技型、新经济新浙商的不断涌入;一边是诸如李书福、南存辉、汪力成、王水福等“不倒翁”的“与时俱进”。“常青树”们不断地“自我革新”,演绎了浙商群体迭代升级的壮丽诗篇。

比如西子联合控股集团的王水福,在40多年的创业历程中,他率领企业从生产农机配件到电梯、锅炉,再到核电设备、航空部件、深海电机,实现了从“浙江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跨越。

正是许许多多善于创新突破的浙商,跨越了转型升级的万水千山,推动了浙江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进而推动浙江迈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犹记得,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中国青春宝集团的创始人冯根生曾多次提起胡庆余堂的“戒欺”匾额,并说:“诚信戒欺是我的规则,也是浙商精神的灵魂。”

是啊,“义利并举、经世致用”的浙东事功学派深深影响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浙江商人。而“诚信戒欺”“义行天下”,也成了浙商普遍遵循的信条。

2020年疫情发生后,遍布世界的浙商用实际行动,书写了“情系故里、回报桑梓”和“大爱无疆”的动人故事。据不完全统计:疫情期间,浙商企业捐赠超万元的达7300多家,捐赠过百万元的400余家,捐赠过千万的50多家;浙商企业设立基金和捐款

捐物累计已超33亿元,其中设立基金14.57亿元,捐款捐物总额18.65亿元。

而当浙江省工商联发出“同心共富”的倡议,浙商可谓是一呼百应。他们争先恐后地投身山区26县和海岛县高质量发展、“万企兴万村”行动、定向招工式“共富工坊”建设等活动。他们一方面构建员工共富生态,让员工变股东,切好共享“蛋糕”;一方面以产业为引领,并以产业帮扶的方式,积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上下游产业链生态,做大共富“蛋糕”。

比如,花园集团董事长邵钦祥40多年如一日,坚持“以工强村”,将花园村这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打造成拥有8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1家上市公司的美丽富饶的“大花园”,带动了数以十万计的老百姓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又如,娃哈哈集团截止2021年,先后在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的17个省市,投资86亿元建立了72家分公司,占总量的近四成;直接吸纳当地人口就业近13000人,累计实现销售收入2119多亿元、利税377多亿元,有力拉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毫无疑问,植根于民间的文化觉醒,才是浙江“两个先行”最内生的底蕴。如是,以“四千精神”和“诚信戒欺”“义行天下”为文化底蕴的浙商,才是真正推进浙江“两个先行”的排头兵和生力军。

又到“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的春耕时节,在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重提“四千精神”,对浙商来说,无疑是一种初心的回望,更是一种力量的蓄积。

是的,回望“草根”创业的初心,用浙商迭代升级而来的新动能,铺展“地瓜经济”的藤蔓,并在发展中不断诠释浙商精神,浙商,一定能够扛起浙江“两个先行”排头兵的猎猎旌旗,迎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无边胜景!

(本文作者系浙商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浙商总会浙商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企业成长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对话浙商》《浙商之变》《浙商1.5代》《中国多头》《中国龙起》《拥抱未来——解码杭州新经济》等。)